



LANGUAGE

语 言 论

——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

徐通锵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语 言 论

——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

徐通锵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徐
通锵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7-100-10011-3

I. ①语… II. ①徐… III. ①汉语—语言学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134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语 言 论

——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

徐通锵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011-3

2014年10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0 3/4

定价: 58.00元

本课题获国家教委“八五”社科基金资助，
并列入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项目、国家教
委“九五”出版规划项目。

自序

这是一本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理论语言学著作。

汉语有悠久的语言研究历史,与希腊-罗马、印度的语言研究一起构成了世界语文研究的三大传统。每一个传统都有自己的特点。汉语研究的传统重实际语言材料的整理与研究,很少进行理论的探讨,因而我们的祖先没有给我们留下系统的理论语言学论著。现在流行的语言理论都是从西方语言学中引入的。这样,“中国没有自己的语言学理论”、“所有的语言理论都是外来的”就成为汉语学术界的一种通论。面对这样的议论,从事语言研究,特别是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人一方面不得不承受这种压力,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这种严酷的、与国家的学术地位不相适应的现实。从无到有,在建立一门新学科的初期,介绍和引进是必要的,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立论精神以发展自己的语言研究,也是完全正确的,但老是躺在西方语言理论、方法的“大床”上咀嚼人家“吃”过的东西,总不是发展学术研究的正确和有效的途径。正确的办法应该是“结合”,把西方的语言理论和汉语的研究结合起来,揭示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阐释它的普通理论意义。但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吕叔湘,1986b)。自《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学基本上是用印欧语的理论、方法来分析汉语,探索“结合”的道路,虽然开创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时期,但是也给汉语的研究带来了“印欧语的眼光”,用印欧语的结构原理来观察汉语的结构。追溯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缺乏一个

正确的立脚点。以往的“结合”基本上以印欧系语言的理论、方法为基础把汉语结合进去研究,而不是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去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立论精神,因而难免出现用西方的语言理论来观察汉语的结构这样的弊端。根据百年来的“结合”的经验教训,我们想转移“结合”的立脚点,就是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立论精神,阐释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为语言理论研究开拓一条新的途径。这一设想实在是“雄心可嘉,壮志难酬”,不自量力。但是,“中国没有自己的语言学理论”的状况总得设法改变,总得有人迈出第一步,哪怕摔倒了,碰得头破血流,也可以给后人做一块“此路难行,过往行人,小心在意”的路标。鉴于此,我们也就不自量力地去走这艰难的第一步。

我们清楚地知道,前进的道路荆棘丛生,为了减少阻力,尽可能把“路”走得好一点,稳一点,差不多花了近20年的时间,分三个阶段摸索前进。第一阶段(1978-1981)是和叶蜚声先生一起,从总结入手,考察“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和音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便从中了解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成效和局限。我们发现,音韵研究的“结合”的成效远远强于语法研究,因为音韵研究没有离开自己的传统,而语法研究由于一切需要从头做起,受西方语言理论的束缚太大。这一考察对我们后来的研究很有启发。第二阶段(1982-1986)是联系汉语方言和音韵的研究,吸收西方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撰写专著《历史语言学》。这一阶段我们对“结合”的研究有了一点深切的体会,就是在文白异读的研究中总结出一种新的叠置式音变的理论和方法,丰富了现行的历史语言学理论。这说明,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是可以总结、提炼出相关的理论和方法的。我们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一些鼓励,因而增强了我们在“结合”的道路上继续探索的勇气和信心。从1987年开

始,我们进入了第三阶段的探索,前后历经10年,走了很大一段弯路,才写成现在的这一本《语言论》。头5年,以语言变异的研究为基础,探索语言系统的动态运转规律,想突破索绪尔的静态语言系统说。写了几篇文章后发现,以汉语方言变异的研究为基础进行语言理论建设,虽然可以在局部问题上对现有的理论提出一点补正,但无法建立一种适合于汉语研究的理论框架;如果要在整体上有所突破,光说“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还不行,必须找到汉语结构的基点。在汉语音节结构规则的指引下,我们终于找到了“字”,觉得在“结合”的道路上汉语音韵研究、方言研究的成效所以强于语法、强于语言理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字”。习惯的力量是顽固的、可怕的。我提出“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之后,从我的同事、朋友到学生,差不多都反对,认为“字”是视觉的符号,是书写的,属于文字的范畴。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字”首先是说的,其次才是“写”的;我们要人家说得慢一点,只能说“你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绝不会说“你一个词一个词慢慢说”,即使是语言学的泰斗也不例外。这就是说,字是汉语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仅仅把它看成一种书写的符号,实在有点儿本末倒置。我坚信这一观察的正确性,认为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进行语言理论的建设就得以“字”为结构本位去探索前进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也很幸运,就在我“四面楚歌”的时候,清华大学为纪念赵元任先生诞辰100周年而翻译出版了他的论文选,其中《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一文明确提出汉语没有与英语的 word 相当的结构单位,“汉语是不计词的,至少直到最近还是如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权威学者的话是有分量的。赵元任先生的论断改变了一些人的看法,也减轻了我们前进的阻力。

字与词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涉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改造,涉及东

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和语言结构的差异。这是由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的发展道路。70年代发展起来的混沌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所谓“蝴蝶效应”。1979年12月,洛伦兹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讲演中指出: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从此以后,“蝴蝶效应”不胫而走,名声远扬。这种“效应”的核心意思是:初始条件的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对其未来的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我们对混沌学不甚了了,但我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古训,意思与这种“蝴蝶效应”完全一致。我们强调字与词的差异就是想关注初始条件、初始状态和理论出发点的“失之毫厘”的微小差异给语言结构带来的“谬以千里”的巨大影响,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应的语言理论建设。印欧系语言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它的研究重点始终是语法,从亚里斯多德到现在,这种重点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汉语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它的研究重点就不能是印欧语类型的那种语法,而是语义。语义是语言学各个领域研究中研究基础最薄弱的部门,难度最大。有人把它比附为“泥潭”,陷进去就拔不出来,直至没顶。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闯”这样的“泥潭”?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任何复杂的现象都隐含着一条驾驭它的简单线索,这已为科学发展史所证明,但问题是如何去发现这种线索;第二,坚信传统,相信在悠久的汉语研究传统中隐含着我们必须继承和发展的真理。汉语研究传统虽然具体表现为文字、音韵和训诂,但其核心是语义。《尔雅》、《说文》系列的著述和古籍的注疏都是经典的语义分析,虽然散见于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中,缺乏系统性,但无疑已为我们进行语言理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何吸收传统的研究成果,用系统性的眼光来观察语义的结构?我们参照汉语社团“比类取象”、“援物比类”的两点论思维方式的特点,提炼出“向心”、“离心”这两个概念,即以

“类”为经，以“象”为纬，“向”纵，“离”横，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观察汉语纵横交叉的语义结构网络，建立语义句法的框架。这是统率全书的基本线索，也是我们以“字”为基点进行语言理论建设的粗浅思路。我们想以此为基础，一方面吸收西方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设法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和现代语言学与汉语传统研究的结合。至于这两个“结合”的成效和得失利弊，限于我们的水平，而且是初创，肯定有诸多我们自己难以觉察的弊病。这只能由读者去评说、补正和改进了。

本书的主要内容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语言研究方法”课程中讲授过，在教学的反馈中受到不少启发。王洪君、郭锐、李娟等同志曾随班听过一个教学过程，并参与了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很好的意见。博士生叶文曦在听课的基础上还选择字义的组配规律撰写学位论文《汉语字组的语义结构》，提出字义的结构格式。这些意见和研究对完善我们的分析、提高本书的质量都很有帮助。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不远千里前来约稿，而后又多次奔波，编辑加工，费了很大的精力。值此本书出版之机，谨向这些协助过本书的编写、出版的同志致以诚挚的谢忱。

1998年是《马氏文通》出版100周年，也是我的两个母校宁波中学和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谨以此书敬献给培育我成长的前辈和母校，以资纪念。

徐通锵

1997年3月16日于北大寓所

目 录

绪论:西学东渐和中国的语言学	1
一 语文研究的三大传统和它们的相互结合	1
二 “印欧语的眼光”和汉语的研究	5
三 字的研究和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的途径	10

第一编 一般原理

第一章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	21
一 两种对立的编码原则和语言研究	21
二 音义结合的理据性和汉语的编码机制	30
三 编码方式与思维	39
四 语言的两种结构类型	54
第二章 语言的结构原理	58
一 共时、历时的划分和静态的语言系统说	58
二 变异和动态的语言结构	68
三 结构关联和语言的自组织性	80
第三章 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原理	93
一 “主语-谓语”结构和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基础	93
二 词的结构与“主语-谓语”框架的结构关联	100
三 重音在结构关联中的地位和音系的研究	108
四 语义的研究和它对印欧语结构关联的冲击	114

第四章 汉语的结构原理	121
一 字和汉语的结构关联	121
二 音节与字音的结构	129
三 字的顽强的表义性和汉语语义型语言的结构特点	137

第二编 音韵

第一章 声母和声母系统	147
一 声母和声母位置上辅音的运转规律	147
二 介音的作用和声母的演变方式	153
三 i 介音和汉语声母系统的历史演变	164
第二章 音系的结构原理和元音系统的演变	174
一 汉语的韵母系统和音系的非线性结构	174
二 音核和元音的运转方式	186
三 离散式音变和音系结构的调整	193
四 合口韵的形成	201
第三章 韵尾的变化和阴阳对转	206
一 韵尾的变化和音系结构格局的调整	206
二 阴阳对转和它的性质	209
三 现实方言的“阴阳对转”和叠置式音变	215
四 阴阳对转和方言差异	219
五 《广韵》阳声字的阴阳异切和它的文白异读的性质	224
六 汉语语音演变的机制	229
第四章 声调的性质、起源和发展	234
一 字和声调	234
二 音节内部响度变化的规律与声调的起源	240

三 汉语声调系统的成因和定型	248
四 汉语声调的演变	260

第三编 字和汉语的构辞法

第一章 字和汉语的理据性编码机制	271
一 “六书”和临摹性编码	271
二 声训和理据	280
三 理据和语言的结构	294
第二章 字族和汉语的语义结构	301
一 字族和字义结构的基本原则	301
二 向心性字族和语源研究(上):声训论和“右文”说	312
三 向心性字族和语源研究(下):上古音系的拟测和字族的构建	322
四 离心性字族和字的本义的研究	330
第三章 结构的不平衡性和单字结构格局的解体	339
一 编码体系的结构不平衡性和结构格局的调整	339
二 单字结构格局和联绵字的“一分为二”	348
三 联绵式的结构和理据性编码机制的转移	354
四 双音辞的形成和单字编码格局的解体	361
第四章 核心字和汉语的语义构辞法	367
一 汉语构辞法的性质	367
二 核心字和汉语构辞法的基本原则	369
三 向心构辞法和它的语义基础	374
四 离心构辞法和它的语义基础	383
五 改进构辞法的研究,就汉语论汉语	390

第五章 音义的相互转化和变音构辞法	396
一 音义的相互转化和四字格的结构	396
二 变音构辞法	405

第四编 语义句法

第一章 字和汉语的语义句法	419
一 语形句法和语义句法	419
二 语义句法的结构框架:话题-说明	427
三 语义句法的结构单位:字、辞、块、读、句	438
第二章 语义范畴	451
一 语法范畴和语义范畴	451
二 “离散/连续”和结构单位的语义分类	455
三 定量和变量	465
四 肯定和否定	474
五 有定和无定	480
第三章 字块和它的标记	489
一 标记	489
二 “离散/连续”对立范畴的相互转化和“的”字结构	497
三 “了、着、过”和带有时间特征的字块	505
四 “把”、“被”和有定性结构单位的移位	516
第四章 字块和语序	523
一 语序和时间观	523
二 向心字块的结构和它的语序	528
三 离心字块的结构和它的语序	539
四 语序与虚字	552

第五章 有定性范畴和语法结构	562
一 有定性范畴和语法研究	562
二 汉语的有定性范畴和它的语法结构	572
三 自动和使动——汉语的两种基本句式	588
引用书目	605
新版后记	632

绪论 西学东渐和中国的语言学

一 语文研究的三大传统和它们的相互结合

0.1.1 语言研究在世界上主要有三个不同的传统: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小学。它们都以书面语为研究对象,基本上属于语文学的范畴,研究的目的主要也是为其他学科服务,没有把语言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对象。严格地说,它们还没有成为语言学,但是由于现代语言学是在这种语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的讨论也只能从这里开始。

0.1.2 希腊-罗马传统的语言研究以古希腊的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为基础,重点研究句法和词形变化;语音的研究依附于语法,没有独立的地位;基本上不讲构词法。虽然偶尔谈到派生(derivation)或构词(word-formation),但分量很轻,缺乏独立性。现在流行的语言理论基本上就是在这一传统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体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

0.1.3 印度传统以巴尼尼语法为代表。印度有文献记载的最早语言就是公元前1000年的《梨俱吠陀》的吠陀梵语,巴尼尼语法就是为适应这种语言研究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巴尼尼(Pāṇini)是人名,根据《大唐西域记》,他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出生于娑罗睹罗(Salātula),在现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附近。“吠

陀”(Veda)是一种经文,巴尼尼语法是解释、诵读这种经文的一种师徒相传的口诀,它本身的体裁就是一种经体(sūtra)。由于语言的发展,巴尼尼时代的语言和吠陀经的语言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时掌握文化大权的祭司阶层(婆罗门)为了保持其所垄断的神圣经典的完整,实行了本阶层内部口头相传的各种严格的诵读方式。由于这种特殊的背景,以巴尼尼语法为代表的印度传统对语音的研究很细致、准确,词的结构的分析也很严密而具体,已经明确地分出词根、词干、词尾、前缀、后缀、派生词、复合词等等。这就是说,它的研究重点是语音和构词法,而这正好是希腊-罗马传统的薄弱环节。梵语是一种印欧语系的语言,和希腊、拉丁等语言有亲属关系,相互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因而它的研究成果很快被欧洲人吸收,形成了两个语言传统的结合。“……梵语语法体系照亮了希腊语、拉丁语和很多欧洲语言的研究,因而出现了存在着一个印度-欧罗巴语系的结论,使我们了解许多语言的亲属关系及其发展前途,并由此对照出非印欧语系的一些语言的特点。这种着重从语言的词的形态(音)分析并比较语言的语法构造和词的关系的研究,在19世纪的语言学中占了主要地位。”(金克木,1981,211)

“结合”是科学研究方法论的一条重要原则。印欧系语言研究的两大传统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统一的印欧语的研究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历史比较法的诞生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仿效梵语研究的语音分析和构词分析,在语言研究中产生了两个新的领域:语音学(phonetics)和形态学(morphology),这为而后结构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语言研究的这些发展除了得力于两大传统的结合之外,还从当时发展起来的科学思潮(主要是生物学)中吸取了自己所需要的理论和方法。比方说,morphology一词原是生物学

的术语,指生物机体的“形式”,借入语言学之后指构词和构形;历史比较法和当时盛极一时的比较生物学的研究方法比较一致,因而研究物种变异的比较方法也渗入并支持语言的比较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518)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指出: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这些科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具有普遍意义”。历史比较法的诞生是语言研究方法论的一次重大转折,它使语言研究摆脱了只为其他学科服务的附庸地位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印欧系语言研究两大传统的结合正值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和文化的扩张,西学东渐,印欧语的研究传统也就敲开了中国语言学的大门,要求与之结合,从而又促进了中国语言学的变革和发展。

0.1.4 汉语的研究传统俗称小学。它以“字”为中心研究文字、音韵、训诂。文字研究“形”,音韵研究“音”,训诂研究“义”,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研究传统,目的是为了读通先秦的典籍。“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王念孙在给段注《说文》写的序言中说的这句话清楚地说明了小学与经学的关系。这种研究传统到了乾隆、嘉庆时期达到了顶峰,形成了一般所说的乾嘉学派。这个学派重功力,轻理论;重视一字一义的研究,忽视整体思路的把握。一部《说文解字》或《尔雅》、《广雅》的“注”和“疏”,对每一个字的来龙去脉可以说得很清楚,但没有明确的理论概括和系统分析,用《孟子》中的“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句话来概括这一学派的方法论,可能是比较合适的。这种研究传统的特点和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传统很不一样,因而随着西学东渐,不能不发生两种传统的尖锐冲突。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和其后出现的“整理国故”的思潮就是这种矛盾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